

瘟疫袭击过的伊姆村留下哪些精神遗产

陆伟芳

2020年初,新冠肺炎疫情袭来,如今已在全世界多点暴发。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,人类有过多番与病毒较量的壮烈往事。此时此刻,近30年前我们在《英吉利的智慧》一书中写到的英国德比郡伊姆村(Eyam,又译亚姆村,埃亚姆村)在瘟疫中的举措,再次回到我的脑海中。伊姆村的故事,无疑值得我们再次讲述。

瘟疫纪事牌

我们先来看看德比郡伊姆村村民居前的瘟疫纪事牌:

索普家9人居住在此,他们全部死了。

托马斯·索普死于1665年9月26日

他的女儿玛丽死于1665年9月30日

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死于1665年10月1日

他的儿子托马斯死于1665年12月20日

他的女儿艾丽丝死于1666年4月15日

他的儿子罗伯特死于1666年5月2日

他的儿子威廉死于1666年5月2日

他的父母老威廉和玛丽·索普死于1666年

罗斯小屋

玛丽·海德菲尔德,原姓库珀,与她的两个儿子爱德华和乔纳森、她的新丈夫亚历山大·海德菲尔德,以及一位雇工乔治·维加斯曾经在此居住。

乔治·维加斯,瘟疫的第一个牺牲品,死于1665年9月7日

爱德华·库珀,死于1665年9月22日,4岁

乔纳森·库珀,死于

1665年10月2日,12岁

亚历山大·海德菲尔德,死于1666年8月3日

玛丽幸存,但失去了13位亲属

瘟疫小屋

这样的牌子还有很多。因为当年,这个村子的350人中,大约有270多人死于一场瘟疫。

自愿封村行动

1665年,英国伦敦受到了一场致命的大瘟疫的袭击,造成了大约10万人死亡,10万人相当于当时伦敦约四分之一的人口!就在这场瘟疫期间的1665年夏末,伦敦有人给伊姆村的裁缝亚历山大·海德菲尔德(Alexander Hadfield)寄了一包布料。裁缝的助手乔治·维加斯(George Vicars)注意到布料有点潮湿,因此把它们在壁炉前打开晾干。他不知道衣料里面藏有带有鼠疫病菌的跳蚤。黑死病就这样袭击了伊姆村。在一周内,乔治·维加斯就发病,皮肤溃烂发黑,成为瘟疫的第一个牺牲者。不久,裁缝家里其他人也相继死去。到9月底,共有5人得病去世。10月,23人死去……瘟疫在村中开始传播开来。这时,伦敦大瘟疫的消息也传到了伊姆村。

村民们大为惊恐,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情绪,有人考虑到附近的城市谢菲尔德躲避。这时,当地的两位牧师威廉·蒙珀森(William Mompesson)和托马斯·斯坦利(Thomas Stanley)担心居民外逃必然会进一步传播瘟疫。他们召集大家祷告,并劝告大家不要外逃,封闭村子,隔绝与外界的人员往来,从而防止瘟疫外传。最后,村民们响应牧师们的号召,自愿隔绝。

这是刻在伊姆村中央空地纪

念碑上的一段话:

走的话未必能活,谁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瘟疫;不走的话就会死,哪怕没感染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。但我们愿意试试,因为善良需要传递下去,后人们要记住善良。

于是,伊姆村封锁了通往北方的道路,并留人劝阻行人。在村庄的边界摆放石头,指示人们不应该超出这个范围。所有伊姆村居民,即使身体健康的人,都誓言在疾病蔓延之前不要离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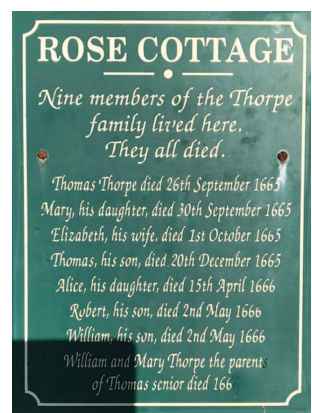
物资供给,则用不接触的方式获得日常生活用品与粮食。该村从附近的其他村民那里得到了食物和帮助,其他村的好心人在城郊遗留了肉类、谷物和其他生活物品。作为回报,伊姆村的居民将硬币放在盛有醋和水的碗中,当时认为醋可以起到消毒作用。今天,仍然可以在伊姆村庄周围看到那些石头。

伊姆村村民还采取一系列预防自救措施来减缓疾病的蔓延步伐。一是将教堂礼拜场所转移到库克利特·德尔夫(Cucklett Delph)的天然圆形剧场,这里是开敞的空间,而且离墓地较远,以减少相互的传染;二是各家各户,尽量关在自己家里,感染者被搬到酒窖或地下室中,各家掩埋自己家的死者。许多幸存的成员经历了埋葬家庭成员的痛苦,就如“瘟疫小屋”中的玛丽一样,牧师蒙珀森也埋葬了他的妻子凯瑟琳·蒙珀森。有时,为了避免与死者接触,人们只能绑住受害者脚部的绳索将尸体拖走。

然而可喜的是,瘟疫并没有越出伊姆村的封闭圈。虽然在持续14个月的瘟疫中,伊姆村的教堂记录显示,一共有273个瘟疫受害者,但也有70多个幸存者,包括33个16岁以下的青少年,在8天之内失去6个孩子和丈夫



瘟疫小屋纪事牌



罗斯小屋纪事牌

神遗产。

这是高度自律的精神典范。伊姆村的封村行动,完全是村民与村民领袖——牧师们的自发行动。人们也曾非常恐慌,也曾计划远逃到大城市谢菲尔德。但在牧师的理性劝告下,人们能够暂时放下小我利益,着眼于广泛的社会。伊姆村的自我隔离行为有效阻止了瘟疫的扩散。

这是高度自尊的行为。据说,后来英王查理二世知道后通报全国,英国人才得知此事。国王发出了该村世袭免税的嘉奖令,但当地人拒绝了这份殊荣。直到今天,村民们依然自律自强,不愿意接受政府的补助。

这是摒弃成风、团结合作的行为。两位带头的牧师,属于各自不同的教派。威廉·蒙珀森应该是一位英国国教会的牧师,而托马斯·斯坦利则是一位清教徒。在这场空前的瘟疫面前,他们团结合作,共同说服村民,实现了封村的行动。

这是后人瞻仰学习的“圣地”。伊姆村在德比郡山谷,地处著名的景区峰区国家公园内。该村规模不大,2011年人口普查中,人口数为969人。但是,整个村庄遍布着有关瘟疫的匾额、标志和纪念物,并把每年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称为“瘟疫星期日”,在伊姆村的库克利特·德尔夫举行特别的纪念仪式。伊姆村虽然没有独特的美景或著名的历史建筑,却是不少人的旅游目的地。前来参观的人们漫步在这座村庄,瞻仰这些边界石并存放硬币,以纪念瘟疫的受害者。

以史为鉴,在全球齐心协力、共同防控新冠疫情的当下,伊姆村村民的举措无疑令人深思。

(作者单位: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中心,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多卷本《西方城市史》”阶段性成果)

伊姆村的精神遗产

黑死病是中世纪欧洲的死神,因为其极高的死亡率与发黑的死者皮肤而为人所知。它的症状还有腹股沟和腋窝发炎的腺体或“气泡”、呕吐、头痛等,感染者极易死亡。当它在1346年和1353年第一次横扫欧洲时,欧洲失去了1亿人口。伊姆村村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,做出了相应举措,它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

◀ (上接3版)

但终究独木难支,医院男女病患“最少数日有百三四十人”,但辛苦募得的经费只是杯水车薪(《申报》,1916年4月2日)。三年后她无奈辞去上海医院院长一职,转而于1917年创办健华颐疾园。

此时的中国,疫灾连连,上海也未能幸免,鼠疫、天花、霍乱轮番肆虐,沪上几乎年年都有疫病。健华颐疾园本为肺病患者休养所用,一开始能在这

所新式小洋房里诊治的患者都是富贵之家,然而天灾人祸不断,张竹君深感贫病者无处投医,再次登报募资扩建病房,免费提供给贫困的病人。除了例行的诊疗,张竹君还多次免费给社会大众接种疫苗。1920年5月在普益社的组织下,张竹君与另一位医生石运玲一起为百姓免费种牛痘预防天花,短短两个星期,约有400人接种(《申报》,1920年5月18日)。张竹君心思缜密,为沪上防疫出力甚多。1926年沪上霍乱大

爆发,除了临时建沪西时疫医院外,张竹君考虑到霍乱多由水系传染,而附近居民多从姚桥浜(今昌平路一带)取水,饮水卫生没有保障,同时该地区人口密集,染疾者众多。为了从根源上杜绝更多人受感染,在各界慈善人士的帮助下,她在医院内加装自来水管,向附近居民免费赠送洁净的自来水(《申报》,1926年8月27日),以缓解当地的防疫压力。

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,张竹君已近花甲,但和数十

年前武昌起义时一样,她满腔热忱,依然在战火硝烟中抢救伤员。1937年“八·一三”事变,张竹君再一次奔向战场救死扶伤。此后战事动荡,上海成为孤岛,张竹君一边行医一边主持教会活动,其名偶现报端,基本都出现在慈善捐助的名单中。1964年,张竹君病逝,上海成了这位“女扁鹊”的安息之地。如今,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还藏有“张竹君医照”,上书“为据愿执此照者,出而行事,矢慎矢勤,利人利物”。张竹君1900年拿

到这份博济医院颁发的行医执照,不顾世俗苛责,以女豪杰身份出入医界、政界,之后潜心行医,将医院和战场视为爱国阵地。只要是关乎生死之事,她便勉力去做,其中的定力和韧劲,值得后来者学习。

(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,本文为上海市哲社科学规划青年课题“清末民初文学汉语转型中的女性表达与性别主体构建研究”阶段性成果)